

乱世奸雄袁世凯

[加]陈志让 著 傅志明 鲜于浩 译



乱世奸雄袁世凯

〔加〕陈志让著 傅志明 鲜于浩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1147312

Jerome Ch'en
YUAN SHIH-K'AI

据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版译出

乱世奸雄袁世凯

陈志让 著
傅志明 鲜于浩 译
责任编辑：喻 新 易文恩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188000 印数：1—7200

ISBN 7-217-00335-0

I·137 定价：2.15元

新书目：88-50

译者前言

本书著者陈志让 (jerome Ch'en 杰罗姆·陈) 是著名 华裔 历史学家。原籍中国四川。1943年西南联大文学士，1956年 英国利兹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先后入英国籍和美国籍，现为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系中国和日本近代史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与东南亚社会史》《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军绅政权》及本书等。同时，撰有大量关于义和团、中国军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区域经济等方面的论文。是北美颇著声誉的知名学者。曾来华访问，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

《袁世凯》是陈氏主要著作之一。本书生动详尽地论述了 中国近代一位著名人物的一生，以及与其有关的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为撰写此书，作者曾花了很长时间在伦敦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包括一批官方档案和不少英文著作。这些都是国内学者所未见或罕见的。由于占有了丰富的资料，同时经过作者精心取舍，潜心研究，因此，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一方面，由于取材翔实。考究，立论客观、严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史学专著；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撷取了一些能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佚闻趣事，熔进了历史前进中的一些波涛浪花，又是一部可供一般读者阅览的历史读物和人物传记，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所

以，本书不仅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国内学者颇具参考价值，而且对于关心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的人们也不无裨益。当我们初读此书时，不由得逐渐萌发了将它译出的念头。复蒙恩师林增平教授热情鼓励，终于在半年多时间里全文译出。

本书1961年初版问世于英国伦敦。第二版系经过著者增订，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刊行。中文译本就是根据这个英文第二版译出的。本书翻译过程中，除对少量名词略作注释，个别错讹稍加诠释外，尽管书中有的论点尚可商榷，我们也均未作删改，一依原文。原文附录有小站军官姓名，因与正文关系不大，此次未予译出。原著所引大段中文书刊资料，因考虑再由英文转译，难免失真，故一般照录中文原文，个别一时难觅者，特加说明。至于简短中文引语，则未加查对，仍依英语译出。

由于时间仓卒，未经著者审阅，加以资料缺乏，译者水平有限，舛误之处必然不少，敬希读者指正。

第二版序言

本书初版问世多年以来，又有大量关于袁世凯的原始材料陆续发表，在台湾尤然。与此同时，对清帝国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兴起，中外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虽曾一度转向毛主义的研究，但对早期从事的课题一直兴趣未衰，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就加以探求思索，从而不断有所发现。重新修订《袁世凯》一书，就是力求以史家和敝人的学术新进展对之重加处理。

这期间，曾对本书初稿提出宝贵意见的维克托·帕塞尔博士，为本书第一版题献的帕西瓦尔·戴维爵士，以及曾负责本书出版发行的斯坦利·安温爵士，都相继谢世。再版此书，也是感于韶华早逝、情景犹存的一种怀旧之举。

我也回忆起我在伦敦从事本书科研探索的客寓生涯。当时，我在一地的办公室中写作，而在另一地寄居，与6位几乎全都籍隶广东的同胞共挤于一斗室，并不得不在沟联两者的地铁中往来穿梭。然而，那时的伦敦对我来说，委实太喧闹了，研究和写作最需静谧。我于是改换了工作，来到了英格兰北部。此后，我才有了个安静的房间，有了个愉快的家。我的整个工作才没有遭到干扰。再次迁居也许正逢其时。

多年来，女儿多方相助，关心备至，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使我能坚持不懈。谨以本版奉献给我的女儿。

杰·陈 于利兹

目 录

第一章	早年岁月	1859——1882	(1)
第二章	朝鲜生涯	1882——1895	(11)
第三章	编练新军	1895——1899	(39)
第四章	出任巡抚	1899——1901	(57)
第五章	总督任上	1901——1907	(71)
第六章	黯然遭贬	1908——1911	(93)
第七章	辛亥革命	1911	(107)
第八章	民国总统	1912——1913	(127)
第九章	铁腕人物	1913——1915	(155)
第十章	洪宪皇帝	1915——1916	(183)
第十一章	奸雄末路	1916	(207)
第十二章	斯人评价		(225)
注释			(251)
征引书目			(281)
译后记			(299)

第一章 早年岁月

1859—1882

旱涝频仍、十分贫瘠的豫中，有一个不甚出名的小县城——项城，它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也远离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扎根的近代文明所泽被的区域。在项城稍北，有个农民叫袁受臣，*他在这里安家立业，养育了4个孩子，其中之一出生在1859年9月16日，取名世凯。

那是一个外侮内乱战火连天的年代。英法侵略军占领了清帝国的首都北京，满洲皇室逃到了热河。与此同时，太平天国(1850—1864)和捻军(1852—1868)起义荡涤着长江、黄河下游以及淮河流域。1860年春，捻军长驱直入，锋指豫中，威胁项城。袁受臣带领全家迁到城东筑堡设防的袁寨。那时，一个大家族为防备在黄土平原上出没搔扰的起义军而筑设堡寨，是十分平常的，这个庇护堡寨属于正在和起义军作战的著名将领袁甲三将军所有。^①这位将军是一位饱读经书的学者，没有受过近代思想教育。事实上袁氏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是守旧分子。在堡寨里，将军的无嗣养子笃臣非常喜爱壮实的婴儿世凯，不久便把他过继过来。这种安排将襁褓中的世凯

* 译者按：袁世凯之父袁保中(1823—1874)，字受臣，捐过同知，在家经营管理田产，横霸一方，不是农民。袁保中共有二女、六子。

带入了这个颇有势力的军人家庭，对他一生的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②

1866年，袁笃臣把世凯带到山东，并延聘了一位颇具声望的经学先生设馆教授，为他有朝一日能在这个帝国升官晋级作准备。这个孩子觉得嚼文不如练习骑有吸引力。有一种传闻说：有一次他捉了一些萤火虫，把它们捣烂涂抹在脸上，一到夜晚，脸上就闪烁发光，以此来恐吓老先生。③早在少年时代，袁世凯就喜欢占卜看相，算八字，以定吉凶。那时他吃酒无度，但还未染上抽鸦片的恶习。他虽被过份溺爱和放纵，但在体格方面，同伴中还很少有几个比得过他。④

袁世凯十四岁时，担任江南盐巡道这个颇能捞钱官职的袁笃臣死去。两年后他的生父逝世。因为他已经过继出去，不必遵从守丧3年的规定。因此，在1876年他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中第一级的乡试秋闱。⑤由于袁世凯成天练习骑，骄奢淫逸，他在考试中落第是不难预料的。不久，刚满17岁的他，就年少娶亲，这对科考落第的袁世凯是一种慰藉。新娘姓于，他们把家设在河南陈州。两年后，第一个儿子克定出生了。*

在陈州，袁世凯结识了一位正在担任塾师的穷秀才徐世昌。⑥他们很快成了挚友，并结拜为兄弟。徐比袁年长一岁。当他们结识时，徐已通过科场的第二级考试。由于袁的资助，

* 沈祖宪和吴佩生，1:2^b-3^b，1917、1、17一期的《华志日报》（香港中国邮报）报导，袁世凯的第一个妻子在1919、1、14在天津去世，袁世凯究竟纳有多少妾是不清楚的，但是据他的一个儿子说（袁克文，PP16---18）袁世凯有16子和14女。

徐世昌1879年到北京参加科举中第三级和最高一级的考试，终于在1886年中进士。^{*}徐世昌走后不久，袁世凯再次参加秋闱乡试，结果又名落孙山^⑦。他原想通过三级科举考试，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事实证明，他能力不济，已完全绝望。于是，他决意从戎，到军队谋求出路。21岁那年，他前往山东，到离芝罘不远的登州，到他嗣父的朋友吴长庆将军领导的庆军中寻求职务。^⑧

在吴将军的司令部，他碰上了一位学者张謇，张常教他习读诗文。^⑨因袁世凯比张謇小6岁，加之他仅有内阁中书科中书的捐衔，所以袁称张为先生。然而，1902年当袁升任直隶(今河北)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时，他称呼这位大学者、大实业家张謇为吾兄。对此，张謇在复信中写道：“尔望正隆，吾名日蹙，然也！”^⑩

张謇对这个年青人的干练和机敏印象颇深。他向吴长庆荐举袁，让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同时他力劝袁放弃对文职仕途的奢望。由于张謇的影响，袁世凯出任庆军营务处帮办，掌管部队的训练和军纪。^⑪

当一场兵变在朝鲜首都汉城发生的时候，1880年到1882年安闲和平的岁月就突然结束了。因为那时朝鲜仍处于中国的宗主权管辖之下，直隶总督张树声调派吴长庆统领的庆军去平定暴乱，袁世凯是这支赴朝军中的一员。

当时的朝鲜是李氏王朝，在位的国王是兴宣亲王的儿子。

^{*} 译者注：袁徐初会时，徐是秀才。他1879年北上，是为了参加乡试，并于1882年录取中举，他参加并通过会试和殿试，得中进士是1886年。又，徐出生于1855年应比袁大4岁。

他是一位温文慈善然而缺少权威的人。1864年他登基时，年方十二，其父以大院君的称号取得摄政权，时人称其为“铁石心肠”之人。^⑫大院君贪得无厌，肆无忌惮，然颇具才干，甚至当他儿子达到亲政的年龄，他仍然控制着政府。在对外事务方面，尽管与美、英、德、法已有接触，但他仍顽固地推行闭关自守政策。中国和日本自门户被西方列强打开后的动乱经历，使他确信平静只有靠与世隔绝才可获得。朝鲜在国际贸易中微不足道，使这种排外闭关政策得以推行。这位摄政者顽固地推行这一政策，有时甚而走向极端。例如，在1866年，他曾下令屠杀了大约2000名朝鲜天主教徒。

大院君觉得，他的政策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西方列强，而是本地区的几股势力。在中、日、俄三国看来，朝鲜商业上虽无足轻重，然而，其战略地位则较为重要。鉴于当时的日本力量太小，它还不敢于向中国挑战，俄国那时对远东还几乎不感兴趣。这样一来，朝鲜的孤立政策只要中国默许即可。然而，1870年后，日本迅速称雄东亚，它对朝鲜的兴趣随之增长。1868、1869和1872年，它多次试图与大院君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屡遭拒绝。这些挫败，在日本引起了相当大的沮丧和政策上的纷争。只是由于古老的满洲帝国尚存的声威，才遏制了日本妄图侵占朝鲜的野心。

1873年，大久保利通政府派副岛种臣为批准中日商约来华，并令其试探中国对朝鲜的态度。总理衙门——中国的外交外贸部——重申了在任何情况下，中国要保持对朝鲜的宗主权的决心。另一方面，总理衙门也表明了这样的意向：朝

鲜的内政由它自己负责管理，它有权作出战争与和平的抉择。^⑩

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的同意，朝鲜要进行一场战争是绝对不可能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欠考虑的，无意中轻率地助长了日本的野心。它给日本不同武士集团对朝政策的争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的局势是如此急迫，以至正在美国活动的大久保及其使团，必须迅速返国，以制止一次对朝鲜的军事侵略。虽然大久保和其他的稳健派人士赢得了这一回合斗争的胜利，但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朝鲜问题始终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问题。暗杀大久保的未遂事件，江藤和西乡领导的叛乱，对福摩萨（即我国领土台湾——译者注）的出兵，都是这一问题的反映。

1875年10月18日，一艘日本小军舰驶近江华岛（位于朝鲜西海岸）以获取淡水，遭到朝鲜海岸守军的炮击，当日本军舰指挥官派出一艘悬挂免战旗帜的小船去调查攻击事件时，再次遭到射击。事后不久，日方对此进行了报复。它派遣了一艘战船轰击了朝鲜海岸，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劫掠了岛上的城镇。然而，日本政府仍不以此为满足。它又派遣更多的战舰来到釜山，威胁说除非缔结一项条约，否则要继续进行报复。随后，日、朝双方于1876年初，在汉城举行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以便提交中国予以批准。条约规定，日本承认朝鲜是在中国宗主权管辖下的、有全权处理自己事务的主权国家。日、朝两国将互派外交使团，同时朝鲜的仁川和元山两港将作为通商口岸，对日本开放。

总理衙门的态度是：只要日本愿意尊重中国的宗主权，中国方面可以和解忍让。总理衙门在写给日本的复信中再次声明，中国无意干涉朝鲜的内部事务。如果日本有与朝鲜恢复友好关系的意向，应该直接与之接洽。^⑯

大院君和他的同伙自然反对这个条约，但是在朝鲜，这时逐渐形成了另外一个政治集团，这就是以王妃闵氏为中心的闵妃集团。闵氏家族当时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贵族地主。闵氏集团确认朝鲜国势虚弱，与外国交往势不可挡，因而支持这一条约。（虽然这种支持反映出该集团的亲日情绪，暗示摄政王不久将被废黜，但是条约的签订，主要是由社会上反孤立主义的思潮推动起来的。事实上，闵后具有中国血统。）中国的颟顸自大和总督李鸿章拒绝在江华岛事件中采取军事行动，加强了闵妃的权力。上述条约于1876年2月27日签字。

被击败而恼羞成怒的大院君，终于有了一个报仇雪耻的良机。1882年7月23日，驻守汉城的朝鲜军人，发现配给他们的大米，是发霉变质掺了砂子的，而这还是他们等了整整一年后才得到的第一批给养。因此，大约一万名士兵发动兵变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领导人前往会见大院君，大院君答应亲自处理这件事，他否认对此事负有任何责任，同时将其归罪于闵妃集团，谴责闵妃集团贪污腐败，痛斥在朝日商大量运出大米。当天，士兵们杀死了他们的日本教官，包围并焚烧了日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凭借一艘英国船只，才死里逃生。但是使馆其他官员不少被毒打至死。次日，乱兵在京城掠抢了多家深宅大院，包括王宫和大院君自己的官邸。有

谣言说闵妃已服毒身亡。首相闵台镐在沟渠中被人找到，伤势惨重。他的儿子闵泳翊(闵妃的外甥)则剃光了头，装扮成和尚，才逃亡到日本。兵变起因于士兵的不满情绪，后来却变成一场反对日本和闵妃集团的运动了。大院君泄了怨，重新接管军政大权，恢复了他自己的独裁统治。

日本对此迅速作出反应。7月31日和8月1日，当日本外相井上馨伯爵匆忙赶到兵变现场的时候，7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另外700名步兵在朝鲜登陆。

谁也没有想到，闵妃并没有死，她已逃脱，其侍女确身带专为她预备的毒药，以备万一。离宫前，她呼吁中国给予救助。尽管李鸿章当时正居母丧，他仍指示张树声派遣庆军和三艘军舰开赴朝鲜。8月10日，海军舰队抵达仁川，10天后，步兵在马山浦登陆。李鸿章迅速派兵一事，并不表明他决心诉诸武力，来达到朝鲜问题的解决。确切地说，他只是打算赶在日本可能采取行动之前，率先派兵进驻朝鲜，同时也是做出一种安抚他的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姿态。他知道即使是他的淮军(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要击败日本，仍然是力量不够的，炮舰也装备不良。李鸿章的德国顾问康·冯·汉纳根曾建议从克虏伯工厂购置现代化的军火装备来加以补充，但是，这在财政上是办不到的。

庆军由3000名士兵组成，分成6个营。本来他们进驻朝鲜，是作为天朝上国派出的武装力量，来援助一个不幸的臣属国的。但是他们的纪律骇人听闻，对朝鲜人强抢豪夺，袁世凯不得已下令处决了数人，才得以制止。中国军队在汉城

郊区设置了他们的司令部以后，吴长庆将军和炮舰的指挥官丁汝昌、马建忠开会，决定如何执行李鸿章的命令。第二天，吴、丁和马对大院君进行了礼节上的拜访。大院君和他的儿孙们殷勤地接待了他们，他的住处布置得十分高雅。指挥官们对这位摄政者的精心安排、有礼得体，印象很深。如同马建忠在他的日记中写的那样，“此君煞费苦心，用意极深。”^⑯当天晚些时候，大院君到吴将军的司令部回拜。宾主双方（袁世凯也在场）在司令部长时间地进行笔谈。不久中国军队驱散了负责警卫这位摄政者的500名士兵，进而强行扣压了他。丁汝昌和一队士兵冒雨将大院君带到南海岸的一个港口马山浦，中国军舰登瀛洲号正等在那里，将这位摄政者运到天津，他在这里被囚禁达3年之久。^⑯

带来麻烦的主要障碍一经清除，1882年危机也就顺利解决。8月30日，日本和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条约规定：日本有权在汉城派驻卫戍部队，用以保卫在朝使馆。这些部队定于一年后撤离，条件是届时没有进一步的事件发生，且日方公使认为日军继续留驻朝鲜已无必要。对朝鲜说来，它已认识到因为中国缺乏保护它的实力，它必须发展自己的力量以求自保。因此国王打算训练一营用于现代战争的500名士兵，他任命23岁的年轻人袁世凯担负这一任务。^⑰而且鉴于中国答应购买必要的机械来为朝鲜装备现代化的兵工厂，一批朝鲜学生被派到天津学习工程技术。

在10月10日，一次皇家纪念仪式上，李鸿章认为袁世凯解决危机有功，将其向皇上荐举。^⑱两天后，皇上批准了袁

世凯在朝鲜的新任职务，授予他同知衔，并赏戴花翎（一种特别令人羡慕的装饰品），他的朋友张謇被授予花翎五品知府。两人仍留在朝鲜。

